

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丛书

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53

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

柏果成 余宏模 编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编 者 话

为了系统积累资料，我们把历史文献记载、报章杂志发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文章、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内容，分不同时期，按民族选编《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丛书》。

在选编中，我们着力使资料尽可能集中、系统、连续，最大限度方便科研、教学、和民族工作。《丛书》适合科研、教学人员和民族工作干部参考，适合民族院校师生教学和学习参考。

但是，限于水平，不免存在事与愿违，疏漏和错误，望读者不吝指教

前 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分，除汉族外，还有四十多个兄弟民族世居、生活或工作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四十多个民族中，主要的有苗、布、侗、水、彝、仡佬、回、壮、瑶、满、土家、白等十二个民族，人口七百四十余万，占全省人口四分之一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聚集较多的省分，居全国第四位。

对贵州兄弟民族状况的了解和研究，开始的很早，及乎历代都有过记载和描述。但清及其以前的各朝代，写的比较笼统和简疏；到了民国时期，除去官方的记述外，还有不少学者的专门研究，但由于当时对民族成份没有科学的识别和划分，所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解放后，党和国家对贵州各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科学识别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是显著的。不幸的是，由于十年动乱和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一工作中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民族调查和研究工作得到了恢复，并有迅速的发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在开拓，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适应当前民族研究的大好形势，民族研究所把以前的科研成果、资料搜集了起来，汇编成册，希望它为今后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大发展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穆 琨

1985年3月20日

序 言

彝族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对开发祖国的西南疆土，创造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遗留下丰富的文化典籍。古老而朴实的民族风情，至今仍然闪耀着瑰丽多彩的光辉。

历代封建王朝的漫长统治，近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彝族人民长期沦于被压迫奴役的境地，彝族社会的进步发展被戴上沉重的镣铐桎梏。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下，根本不承认彝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民族，甚至动用了现代化武器的飞机大炮，对彝族聚居地区进行血腥的残酷镇压。

彝族人民具有反抗外来压迫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一直前仆后继，团结战斗，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多少英雄志士血洒疆场。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彝族人民才最终迎来解放，获得新生。

建国三十多年来，彝族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先进民族的大力支援下，广大彝地区由原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落后阶段，飞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不断改善，得到提高。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要继续做好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教育全党努力完成党在民族工作中的各项任务。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彝族有五十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黔西北、黔西南高寒山区。在历史上彝族的分布曾遍及大半个贵州，彝文典籍和碑碣虽经历代沧桑，至今还有不少遗留。在开发贵州和反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和贵州的其他兄弟民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内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

根据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奋斗目标，要把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上来。在民族地区抓紧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首要的是坚定地树立摆脱贫困的勇气和信心，要有敢于治穷致富的智慧和气魄，要依靠群众，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奋发地把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同时，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材，是放手让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要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建设任务，

真正变成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在民族地区真正扎根；也只有依靠各族人民自觉、自主地去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取得四化建设的胜利。

除了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对现实的调查研究外，认真学习彝族的语言文字，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研究彝族的历史、哲学、文学、民俗、天文、医药、建筑、工艺等各部门学科，都是为了有利于彝族地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两个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也是为了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对贵州彝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过去，老一辈的学者中，如方国瑜教授、马长寿教授和胡庆钧教授、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对贵州彝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做了可贵的奠基工作；丁文江教授和彝族的罗文笔、王兴友、罗国义等老先生，对彝文典籍的翻译整理，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但是，相对而言，对贵州彝族的研究还远不能赶上现实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还要继续努力，辛勤劳动，多出人材，多出成果。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一度中断了对民族研究和地方史的研究又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给予恢复和加强领导。涌现出一批热心研究贵州彝族各门学科方面的人材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培养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本论文集就是在打到“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下，他们近些年来劳动的结晶。虽然还存在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总是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艰难征途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们满腔热情地注视着他们继续在新的长征道路上，勇于去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即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召开全国彝族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讨论彝族学术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影响，我们热烈地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这本论文集就是献给会议的一束索玛花，它带有贵州高原上的泥土清香。虽然花朵还不是十分茂盛，但它却是经历了严冬季节破土而出，在百花丛中竞吐芬芳，展笑开颜，共同欢颂祖国明丽的春光。

安 毅 夫

一九八五年春节

目 录

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	蒙 默 (1)
试论彝族渊源·····	罗希吾戈 (10)
彝族“六祖分支”刍议·····	罗希吾戈 (26)
略论我国彝族古代社会及其发展·····	陆 思 明 (30)
贵州古代彝族与夜郎族属关系·····	余 宏 模 (47)
关于东爨乌蛮诸部的族源问题·····	李 绍 明 余 宏 模 (66)
“罗施鬼国”考·····	陈 天 俊 (75)
罗殿国形成史·····	陈 天 俊 (81)
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	史 继 忠 (91)
辨罗甸国与罗氏鬼国·····	王 燕 玉 (100)
亦溪不薛考·····	史 继 忠 (111)
元代贵州宋隆济、蛇节起义·····	罗 友 林 (116)
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	胡 庆 钧 (124)
试论明代“水西”的政治制度·····	史 继 忠 (145)
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	史 继 忠 (152)
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探证·····	余 宏 模 (272)
明清时期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范 同 寿 (282)
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	乔 云 生 (287)
清代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余 宏 模 (301)
贵州少数民族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姜 钟 彝 (311)
贵州少数民族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所作的斗争·····	姜 钟 彝 (320)
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	余 宏 模 (326)
明代万历壬辰水西大渡河桥彝文碑·····	余 宏 模 (333)
贵州水西安氏成化大铜钟初揭·····	何 静 梧 史 继 忠 黄 才 贵 (342)
龙场九驿 水西十桥·····	史 继 忠 (344)
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	余 宏 模 (350)
水西彝族爱国历史人物奢香·····	余 宏 模 (357)
明代贵州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俞 伯 巍 何 长 凤 (360)
关于奢香的功绩和史料·····	张 捷 夫 (369)
安健传略·····	安 瑞 琮 (375)
彝族诗人余达父及其《悽雅堂诗集》·····	余 宏 模 (377)

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余宏模	(388)
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	丁椿寿	(395)
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	席克定	(403)
古代彝族布慕刍议·····	余宏模	(412)
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余宏模	(420)
试谈彝文典籍的学术研究价值·····	陈英	(426)
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	李延良	(430)
彝族文献《宇宙源流》哲学思想浅析·····	李延良	(434)
《宇宙人文论》哲学思想源流初探·····	龙厚华	(438)
略论彝族古代时空观的发展·····	王天玺 巴木阿衣	(447)
《西南彝志》中朴素的自然观·····	陈世军	(454)
彝族的“哎哺”五行学说与彝医思想·····	王槐卿	(460)
贵州彝族史诗《洪水泛滥史》初探·····	安尚育	(463)
《西南彝志》中的英雄史诗成份·····	张福三 傅光宇	(471)
幼芽为什么没有长成大树·····	张福三 傅光宇	(476)
浅谈彝族史诗中的神·····	安文新	(479)
后记·····		(482)
贵州省彝族人口分布·····		(483)

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

蒙 默

彝族起源问题，是彝族研究中迄今尚无定论的重大问题之一。有同志认为：“云南之为彝族的起源地是丝毫没有问题的。”①但更多的同志则认为彝族是外地迁到云南来的：有东来说，认为彝族与古代楚国有关，是楚将庄蹻进军西南时迁来的；有西来说，认为彝族来自西藏，甚或认为来源于欧洲的雅利安人；②有北来说，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代羌人”，是河湟或赐支河首羌人的南迁；③还有人认为“夷(彝)与越是同族”，“现今彝族人肯定是古夷越人的后裔”，④则彝族似乎又当来自南方了。

这些纷繁的说法中，最不足据的是彝越同族说和雅利安种说。彝、越同族说的唯一根据是《史记·楚世家》与《华阳国志·南中志》里有“夷越”一词，而夷越有时写成彝越，于是彝族便与越人同族了。⑤像这样的论证方法和立论根据显然都是不科学的，是不值一驳的。至于彝族雅利安种说，本来就是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捏造，没有任何科学根据，除了在法西斯种族主义猖獗时曾一度流行外，早已为郑重的学者们所鄙弃。在当前，即便是热衷于制造中国人种新西来说的霸权主义反华文人，也不能不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彝族雅利安种说是与实际材料相矛盾的，而不敢援以为助。

除此两说外，其余诸说虽也各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但其考论都还不够充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也只有继续探讨，才能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笔者愿在这里把近年探索的管见提出来向读者请教。

(一)

过去在探索彝族族源时，除少数同志外，一般多局限在汉文献上，而对本民族的文献和民间传说都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无可讳言，这些民族资料常常带有神话色彩，甚或矛盾牴牾，但若结合其他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是可以发掘出其合理的内核的。

凉山彝谚说：“人从北方来”，民间也传说，“彝族最初住在西北高原某处”；⑥贵州古彝文典籍也说彝族过去“住在世界北方”。⑦云南彝族中也有老家在北方的传说。⑧可见彝族来自北方的说法是云、贵、川三省所共有的。此外，川、滇西部地区与彝族居处相邻、语言相近的彝语支各族为纳西、哈尼、拉祜等族都有来自北方的传说。⑨因此，我们认为，彝族北来说应当是可以信从的。

但是，有不少同志（包括我过去）总是把这个北方与古代羌人联系起来，认为彝族是河湟羌人或赐支河首羌人的南迁。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难于成立的。

第一，这个北方的地望应当是旄牛徼外而不是河湟之地或赐支河首。

所有上述彝族来自北方的传说，都缺乏确切的具体地点。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给我们提供了探索这个北方的线索。《勒俄特依》说，万物之源出于雪，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六种，无血的六种，人是有血的六种之一。^⑩万物和人类都起源于雪，说明彝族的最初住地应当是在高原积雪之地，或邻近高原积雪之地。《勒俄特依》又载有“开天辟地”的故事，故事叙述恩体古兹（凉山彝族传说中类似造物主的神）在开天辟地时的第一道工序是：

“制造四把铜铁叉，交给四仙人：一把制给儒惹古达，去开辟东方，东方裂一口，似显又不显，风从这里吹进来；一把制给署惹尔达，去开辟西方，西方裂一口，似显又不显，风从这里吹出去；一把制给司惹低尼，去开辟北方，北方裂一口，似显又不显，水从这里流进来；一把制给阿俄署布，去开辟南方，南方裂一口，似显又不显，水从这里流出去。把天撬上去，把地掀下来，四方开了四裂缝。”

贵州古彝文典籍《宇宙人文论》在叙述天地形成后风雨产生时，也说：“北方以水为本”、“水从北方来。”这些传说都启示我们：彝族先民所知道的最初世界是在一个江河之水南北流的地区。这个江河之水南北流的最初世界，应当就是彝族先民的最早住地。彝族先民最早住地的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给彝族语言打下了深刻的记印。凉山彝语说东方是“ggexddur”，其原始意义是“日出；说西方是“ggeji”，其原始意义是“日落”；说北方是“yyxo”，其原始意义是“水头；说南方是“yyxhmy”，其原始意义是“水尾”。这个以水头、水尾表北、南的彝语词汇在贵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都还找得到。

这个在近代彝区的北方或西北的江河之水南北流而又积雪之地的地区，只能是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这一地区的海拔一般在三千公尺以上，到处是雪山重叠、峡谷纵列。自大渡河以西，纵列着南北奔流的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而汇入这几条大江的主要支流也基本上都是南北流向。这个地区在古汉文献中被称为“旄牛徼外”。旄牛，西汉县名，一般释为大渡河边的汉源或泸定；^⑪旄牛徼外，指大渡河以西的广阔地区。

像旄牛徼外这样的特殊地理条件，无论是河湟地区或者赐支河首都是不具备的。同时，这样的地理条件，对于那些只是在迁徙中路过这里的民族是不会在其历史传统和民族语言上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的。

我们对彝族先民最早住地的这个推断，还可以在古文典籍和考古工作的最新成就中得到印证。

贵州《安顺府志》卷二十二《普里本末》引《罗鬼夷书》说：“一世孟赧，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鹵。”就说明彝族先民在入居于“邛之鹵”之前是住在“旄牛徼外”地区的。尽管“旄牛徼外”一语颇似译者之词，但结合上述分析来看，这绝不是译者的捏造，而是有根据的，可以凭信的。

考古工作者于1978年和1979年夏，在西藏自治区东部澜沧江岸的昌都县卡若村发现大面积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发现房屋遗址33座。经炭十八测定，绝对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据参加第二期发掘工作的童恩正同志告我，卡若文化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有一定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独立发展的考古文

化，此种文化在康藏高原东部尚有较广泛的分布，其影响甚至达到云南北部地区。虽然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对这种古文化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较准确的分析，更谈不上它与彝族起源有何联系，但这种古文化的发现，有力的说明古代甘孜州一带——也就是旄牛徼外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河湟羌人向西向南迁徙之前一千多年，已存在着独立发展的远古文化。

因此，我们认为，彝族来源传说中的北方，应当是旄牛徼外，而不是河湟或者赐支河首。

第二，河湟羌人南迁与彝族先民无涉

彝族是河湟羌人南迁说的主要根据是《后汉书·西羌传》里的这一段话：

（羌无弋爰剑）“遂俱之入河湟间（《续汉书》曰：遂俱之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氐牛种。越西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但是，这段话除了说明旄牛种是居住在越嶲郡而外，没有任何可以说明旄牛种与彝族先民有内容。汉代越嶲郡的大部分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境，近年来凉山州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个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场所，仅从墓葬的形制看，就有大石墓、石板墓、土坑墓、砖宝墓、崖墓等几种，而石板墓还有两种类型。从汉晋文献上看，有邛人、笮人、濮人、叟、斯叟、旄牛、摩沙、僰人等等。如果不能说明旄牛种与彝族先民有何关系，则这条资料在讨论彝族族源时便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我们认为，汉代越嶲境内的这些民族，与后世彝族有关系的民族是叟人（下节有专论）而不是旄牛，方国瑜先生在《公些民族考》中指出旄牛种是纳西族，是正确的。

同时，据贵州古彝文典籍所载，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鹵的孟赳，在笃慕俄前三十一世，笃慕俄下至水西土司安坤八十四世，则孟赳为安坤一百一十四世祖，以每代二十五计，则孟赳距安坤2850年以上，安坤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为吴三桂所杀，则孟赳约当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清末彝族学者余若琰在《且兰考》中说：“孟赳当殷周之世”，也颇相合，当是有根据的。而《西羌传》所载河湟羌人西迁南迁则在秦献公初立之时，在公元前384年。两者在时代上相差太远，显然不是一事。

因此，我们认为，河湟羌人的南迁与彝族先民无涉。

第三，古代旄牛徼外的主要居民是与西羌不同的“夷”。

关于古代西羌情况的记载，以《后汉书·西羌传》较为详尽，它对西羌的人起源、住地、迁徙和支派等都有记录。据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尔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

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把“蜀汉徼外蛮夷”明确认为是与西羌不同的民族。这个赐支

河首之南的“蜀汉徼外”正是“后山以西”和旄牛徼外之地。因此，尽管《华阳国志·蜀志》把旄牛徼外的民族称之为羌：

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徼）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范曄在作《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时，全抄此文，但却改“徼外羌”为“徼外夷。”所改虽只一字，但却关系不小，而且也非偶然。我们知道，范曄在《西南夷列传》的冉駹传中说，“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说明范曄是深知夷、羌、氏三者之间的差异的，可能正是他见到旄牛徼外民族不同于羌而同于夷而特意进行更改的。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自“汶山以西”（略当今阿坝藏族自治州西部及其以西）旄牛徼外共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这众多的民族部落中，其名称之可考见者只白狼、楼薄、槩木三个，其族属之可略考者又只白狼一部而已。白狼部落由于《东观汉记》用汉字记录了一百七十六字的《白狼歌》本语而驰名于世。这首白狼歌本语曾引起不少民族研究者的重视，先后进行考释者达七、八家。虽白狼语的系属迄今尚无定论，但它属于藏缅语族而与彝语支特别是纳西语十分接近，则是多数学者的看法。丁文江《爨文丛刻序》曾指出，白狼歌中与彝语相同的词汇有二十多个，这说明彝语与白狼语有亲属关系。《北史·党项传》说白狼部“自谓猕猴种”，凉山别本《勒俄特依》也说人是猴子变的。③彝族先民与白狼部落先后同住旄牛徼外，语言上有亲属关系，又同有猴祖传说，因此我们认为彝族与白狼部落应有共同的起源。

《北史·党项传》把白狼部落属之于党项羌，但《后汉书》的《明帝纪》、《和帝纪》、《西南夷列传》以及《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都不称之为羌而只称为白狼夷或旄牛徼外夷。大家都知道，古代用作族称的“羌”字，有时是专指羌族，有时则是泛指西方游牧民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就是明显的一例。古代西方游牧民族绝不止西羌一族，故党项、白狼虽有羌称，而《唐会要·党项传》、《旧唐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宋史·党项传》等都明确指出它是“汉西羌别种”；就是说，它是与汉代西羌不同的另一种“西戎，牧羊人。”因此，范曄对旄牛徼外民族和白狼部落都只称之为夷而不称之为羌，是有理据的。

同时，旄牛徼外民族之被称为夷，应当也非偶然。我们知道，出自旄牛徼外的彝族有很大部分自称“聂苏”，凉山彝族虽现自称诺苏，但其古称则为“聂”彝语支的哈尼族自称哈尼、豪尼、多尼、海尼、和尼，傈僳族自称傈僳，纳西族有一种自称是“米”，白族中有一种自称是白尼，这些自称中的主要音节都是“聂”（或尼）。藏缅语族中的一些语言也常称人为米。这些都可能是被称为夷的根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彝族的来源是旄牛徼外夷，而不是河湟或赐支河首羌。

（二）

贵州彝书说：“一世孟赧，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鹵。”这个“邛之鹵”无疑是彝族先民在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方。但对邛之鹵的解释，即便是通晓古彝文的彝族学者也是各说不一。余若璩在《且兰考》中说：“今之昭通、镇雄、叙永、永宁、大定、毕节诸境、夷谱谓始祖孟赧世居邛鹵即此。”但彝族发展至昭通、镇雄、叙永、永宁、大定、

毕节等地皆孟赧三十一世孙六祖以后之事，《西南彝志》中有明确记载，其时代有谱系可考，孟赧之世何得居此！余氏之说显为以今衡古，不是史实。杨砥中在《有关凉山彝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中说：“邛之酋即大雪山脚，指祖国西北高原一带。”苟如杨说，则孟赧不是自旄牛徼外南下，而是自旄牛徼外北上，则彝族又何能迁至滇黔境域？杨氏之说显然也是不足凭信的。民国《贵州通志》引《兴义志》说：“初，秦时有孟赧者事邛君，邛君邑之。西汉初，其种类繁盛，由泸入滇以西，地方千里，成为所有，是为昆明夷，《史记》所云嵩昆明也”。④方志所载常据传说，这个传说中的迁徙路线倒是颇合地理情况的。雅砻江、金沙江于古皆有泸水之称，彝族先民自旄牛徼外沿泸水南下，首先便是居于古代邛都夷（今西昌一带）之西，于是与邛君发生了关系。然后又再沿泸水南下，到达滇西的洱海昆弥地区，为汉初之昆明夷。如果说“邛之酋”应译为“大雪山脚”，则这个大雪山不是祖国西北的大雪山，而应是云南西北的大雪山。

《兴义府志》和贵州其他一些地方志，如《贵州通志》、《安顺府志》、《大定县志》等，都把彝族先民与古代昆明夷联系起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北宋初年所纂的《旧五代史》中，就把五代时贵州地区彝族大首领罗殿王称为“昆明大鬼主”。如以《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昆、叟习俗与近世彝族比较，情况就更清楚。

“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集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之谓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婚曰‘遑耶’、……恩若骨肉，为其捕逃之藪。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速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

藏缅语族中的一些民族多称“人”为“米”或“明”，故这里的“昆”也就是“昆明”。文中所说的“木耳”当为耳饰，“环铁”当为手镯，“裹结”即裹髻，这些服饰都与近世彝族相合；特别是裹髻，更是彝族的特征。“耆老”的产生与其“便为主”，也与凉山彝族的“德古”、“苏依”所于长于辞令、善于排难解纷，为群众所信服，而自然形成家支领袖的情况相同。“夷经”即凉山彝族中的“尔比尔吉”（格言谚语）、《玛木特依》（训世经）之类。“遑耶”，当即凉山彝语中的“onyi”，贵州彝语中的“Alrri”，意为舅父，亦即岳父。⑤彝族最重舅家，是打冤家中的首要联盟对象，正所谓“恩若骨肉”。“徵巫鬼，好诅盟”，近世凉山彝族犹盛。“官常以盟诅要之”，也正是历代王朝对凉山彝族的统治手段之一。古代昆、叟习俗与近世彝族这样相合，这又说明《旧五代史》以昆明称彝族先民是完全正确的。

昆明之名始见于《史记》，其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书都有记载。我们从诸书所载昆、叟活动的地域，可以看出昆、叟民族发展的趋向。《史记》常把犍、昆明作为一个民族集团来叙述，据其所载，犍、昆明早期是游牧在今天全、汉源以西，南经木里、盐源、丽江、大理至保山一片狭长地带，也就是旄牛徼外及其迤南地区。据两《汉书》和《三国志》所载，昆明后来又自洱海大理向东发展，分布遍及滇池地区和滇北、滇东北一带，并渐及于四川凉山和黔西北地区。至隋唐时期，昆明又更发展至黔西南和黔东南了。⑥

但是，彝族先民向外发展所指向的洱海以东的辽阔地区，无论从文献记录或从考古

发掘来看,在公元以前,其主要居民都是濮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除滇西、南以外的云南地区,居住的是以滇、靡莫为代表的部落集团;除黔东以外的贵州地区,居住的是以夜郎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四川凉山地区,居住的是以邛都为代表的部落集团。这三个部落集团主要都是属于濮人系统的民族。^⑩解放以来,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铜石并用文化遗存和青铜器文化遗存,经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也认为属于濮人系统的文化。此外,洱海地区所发现的公元前1150±90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据研究,也认为属于濮人文化。^⑪这说明,在彝族先民自旄牛徼外入居洱海之前,洱海地区也是濮人居住的地方。

这一论断,在古彝文典籍中也可以找到证明。贵州古彝文典籍《宇宙人文论》在《日月根源》一节中说,宇宙初生时,还没有日月,天昏地暗,后来产生了日月,从此“日月濮国灿”;意译为“濮国的天空,日月灿烂”。译者注说:“西南地区古老居民为濮族,亦称濮彝(夷),濮国指这些地区。”《彝文丛刻·说文》载,上古之世,上帝建筑三座圣台,以治天国、掌地国,从此人类繁盛,万世相继。而建筑圣台的大树是“生于东山阳,头顶齐天界,根扎地已深,枝长四方蔽,濮邑遮四城(意为遮盖了四个濮人城邑)。”这两个记载都说明,在彝族的传说中,濮人是西南地区最老最老的居民。

因此,彝族先民——昆明自旄牛徼外南迁洱海地区及其向东发展,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濮人,于是昆、濮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过程便开始了。《西南彝志》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彝族先民与濮人相遇后,征服了濮人,占领了濮人的土地,于是“濮变彝了”的传说(当然也有“彝变濮了”的传说)。这些土著的濮人于是便大量地逐渐与南来的彝族先民相融合。虽然《西南夷志》所载彝、濮融合的历史时代都在六祖之后,但濮人既为西南土著,则彝、濮融合应当从彝族先民迁徙南来就开始了。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发掘。《彝族简史》(初稿)的编者指出,“彝族是许多氏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但觉稍嫌笼统而欠准确,需要略作修改和补充。“是许多氏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一语,应修改为“是旄牛徼外昆明夷部落与西南土著濮人为主的很多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需要补充的是形成的时期和地域问题,我们将在下节中具体讨论。

由于彝族是南迁昆明人与土著濮人相融合而形成,因而在民族面貌上既有北来民族的特点,又有南方民族的特点(如跳足、泼水为戏、鸡卜等等);土著濮人原已具有较高文化,因而在融合形成的彝族文化中吸取了大量濮人文化。

濮人是个古老的民族,在古汉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早有记录。公元前第一千年时。已分布在自江汉流域经巴、蜀、牂牁而西至滇池、洱海的辽阔地区。由于部落分散、支派众多,故古人常以百濮称之。当昆明人南迁、东进与西南濮人融合之际,楚人也崛起于江汉流域而与江汉濮人相融合。《国语·郑语》说,楚“叔熊逃难于濮而蛮”,“而蛮”就是接受濮人文化。尔后,“楚蚡冒是乎始启濮”,楚武王“始开濮地”,^⑫楚国在融合濮人(当然不仅止濮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楚文化中也就大量地吸取了百濮文化。

彝族东来说的主要根据，就是彝族文化与楚文化有某些共同之点，认为这是楚将庄蹻进军西南把彝族先民迁到西南所带来的。但是，庄蹻及其后裔所统治的是以濮人为主的“滇国”，而作为彝族先民的昆明人在西汉时还处于“无君长、无邑聚”状态，非庄蹻及其后裔所能统治；而且，昆明与滇常相攻杀。这些事实将难以说明彝族先民昆明人是庄蹻王滇所迁来的。更何况庄蹻王滇一事就还未必可信。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彝族文化渊源于楚文化，毋宁说两者都吸收了共同的濮文化，是濮文化在彝、楚文化中的反映，还更妥当一些。

上面对彝族的来源与形成问题作了概略的分析，从彝族是昆明与濮人在云南融合形成来看，则说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也是可以的。从彝族广大群众是土著濮人的后裔来看，则说彝族是云南土著也不为错。从形成彝族的主体是来自旄牛徼外的昆明来看，则彝族北来说当然是对的；但旄牛徼外近世常被称为东藏地区，历来与藏族（或其先民）关系密切，且藏、彝两族同有猴祖传说，彝族中又还有藏、彝同祖传说，因而说彝族来源于西藏也未尝不可。因此，我们认为，前所关于彝族起源的各种说法，虽还考论得不够充分，但却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一定的历史真实，有其一定的合理成份。是不能简单地否定的。

（三）

民族的形成是民族起源研究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起点，是一个民族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因此在探讨彝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其形成的时期与地域是不能回避的。

自《元史·地理志》以来，《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记要》等书，都说西南各地彝族是仲牟由之裔。迄至近世，云、贵、川三省彝族民间还流传着洪水泛滥和仲牟由避洪水的故事。如果说孟赧是彝族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则仲牟由便可说是传说中的半神话历史人物了。汉文献所称的仲牟由贵州《西南彝志》称为笃慕俄，贵州地方志或称祝明、或称隆穆，凉山《勒俄特依》、《玛木特依》称为居木武吾，云南称为阿濮独木西（李绍明同志说“阿濮”意为祖宗，“独木西”为其名）；很显然，这些都是同一名称的异读异写。各地所传洪水故事，其情节也大体相同。贵州古彝文典籍《洪水泛滥史》说，策更苴（上帝）为了惩戒下民、下令放洪水淹没凡界，就是所谓洪水之灾。洪水泛滥之后，人类都遭湮灭，只笃慕俄一人因得仙人指点得以不死，漂流到洛宜山居住，后与天女结婚，生下六子，是为六祖。大约在此后十代左右，六祖子孙繁衍，形成乍、武、糯、恒、布、默六部。后世彝族大都是此六部之裔，有谱系可考。六部之名，凉山《勒俄特依》与贵州《西南彝志》完全符合，当是可以信据的，虽然云南相当部分彝区已没有六祖传说，但仲牟由和洪水故事则仍流传民间。上面谈到的《阿濮独木西》，就是流传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史诗^{②①}同时，僻处中、老、越边境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同样有洪水传说仲牟由（这里叫易普笃年）的故事。^{②②}因此，我们认为，仲牟由是彝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根据彝族传说，一世祖孟赧的子孙中，只有仲牟由——六祖一系

才被认为是彝族，其余则不是彝族。如四世施雅立，其子孙中有一系就在《西南彝志》中被称为施族（据毕节翻译组罗国义同志告）；又如二十五世武洛撮，他有十二个儿子，只撮珠笃下传为彝族，其他十一子传为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有的后来“变汉族去了。”②

《西南彝志》中常谈到的武族当即其中之一。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考论施族、武族的族属，但他们在《西南彝志》中不被当作彝族则是毫无疑义的。施族、武族之名在六祖后十来代就已出现，这就表明，当时彝族已充分认识到他们和同祖的其他人们共同体已经有区别而另是一族了。

还应指出，《西南彝志》中记载了不少“彝变汉了”、“彝变濮了”、“濮变彝了”，“彝变阿乌了，彝变六额了，以及其他一些彝、汉关系，彝、濮关系的记录；而且其出现的时间也还比较早，如该书卷五载乍部始祖五世孙取能乍时，有些衰败之户与汉族同化，变汉族去了；恒部始祖八世孙恒雅妥之世，也曾发生彝变濮之事。这都说明，在六祖之后十代左右，彝族对于他们与其他民族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其民族自我意识是很清楚的。

民族区别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出现，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可暂定，彝族在仲牟由或六祖之后十代左右已基本形成。据贵州彝谱，仲牟由至安坤84代，安坤死于公元1664年，以每代25年计，则仲牟由略当公元前436年。据凉山彝谱，仲牟由至解放时84代，②则仲牟由略当公元前151年。综合川黔传统，可姑定仲牟由的时代为公元之前三世纪，则彝族的形成可姑定为公元前一世纪。

彝族是西南地区人数众多、分布辽阔的古老民族，早已遍居云、贵、川三省广大彝区。凉山彝族早在公元前后就已开始进入凉山。凉山传说，自古侯、曲涅进入凉山已是七十多代，则已一千八、九百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东汉前期的苏祁叟，《华阳国志·蜀志、南中志》所载东汉晚期的越隽叟，就是迁入凉山的彝族先民。近年来，凉山地区发掘一批石板墓和大石墓，其时代大约自战国至西汉后期，彝族称这些墓为濮苏乌乌墓，彝语“濮苏”就是濮人。凉山彝族传说，濮苏乌乌是先于其祖先住在凉山的土著居民，彝族来凉山后，与这种人还有过交往，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这种入便绝了。我们从这些濮人墓葬的时代也可推知彝族最早进入凉山大致是在纪元前夕。又嘉靖《马湖府志》载，马湖土官安氏自汉居于马湖，至明成化23年（公元1487年）已58代，以每代25年计，则安氏始祖正当在公元之初。各项材料大都相合。至于滇、黔彝族向四方的发展，其时代可能还更早一些（可参考余宏模：《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载《夜郎考》）。

由于彝族社会发展迟缓，长期停留在奴隶制阶段，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各地彝族之间很少联系交往，但在经过一个八、九百年的分散发展之后，尽管在语言和习俗方面也发生较大的差异，而各地彝族究竟还保持着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民族的共同特征。如果彝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分散各地之前尚未基本形成，则近代彝族的这种状况将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那种把彝族基本形成时期放在汉晋以后，甚至放在十五世纪的观点。

至于彝族形成的地域，我们认为应当从仲牟由和六祖的活动地区去探寻。据《西南彝志》卷五说：“佐雅纪堵就是六祖建立家园的地方”。但这个佐雅纪堵目前尚不知究

在何处。仲牟由的活动地区，除了知道其避洪水的高山而外，也别无所知。我们姑从仲牟由避洪水的高山着手。

贵州在彝文典籍《洪水泛滥史》和《西南彝志》都说仲牟由避洪水的高山是木雅洛宜山，译者认为在今滇东北的东川会泽一带。凉山《勒俄特依》称为兹洪尔碾山、《公史传》称为木昊鲁陵山，译者认为也就是滇黔所称的洛宜山。云南楚雄州的《阿濮独木西》说避洪水在乌蒙山。其实，洛宜山就是乌蒙山的一脉。三省传说相同，应当是可信的。但是，凉山彝族民间又有母系时代大神支格阿龙坠死滇海的传说，彝谚中又有“滇海之内，有石是我母”之句，都说明远古彝族当与滇池地区有关。同时，彝族成人死后有念《送魂经》把死者灵魂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的习俗，凉山彝族的送魂路线是经美姑、永善、送至昭通、再继续往前（其地名现尚无法译出）；彝良彝族则在送至昭通后再送至东川，又再送至昆明。^④而弥勒、路南的彝族又都有从大理经昆明迁来之说。^⑤因此，马长寿先生说，彝族祖先仲牟由在洪水时期已经住在滇池一带，^⑥不是没有可能的。

大家还知道，历史上的洪水传说总是以一定的远古时代洪水灾害为前提的，云南地区的洪水灾害不可能继续发生在乌蒙山区而应当发生在滨湖临江的地区，因而马先生的说法可能更合理些。至于避洪水与乌蒙山之说，当是仲牟由在洪水之后移居乌蒙山区，以免再遭洪水之厄。同时，彝族先民昆明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对一个游牧民族说来，滇池至东川会泽相距不过二三百公里的地区，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活动地区看待的。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仲牟由的活动区域略在滇池东川会泽一带，所谓六祖建立家园的佐雅纪堵很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内。彝族基本形成的地域也就是这一带。

总起来说，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旄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与以濮人为主的土著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其基本形成时期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其形成地域可能在今滇池至东川会泽一带。这就是我们的初步看法。谬误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原载《思想战线》1980年1期）

注：

- ①马长寿：《彝族古代史》（初稿，油印本）第一节。
- ②见《西方著作中关于彝族的论述（摘译）》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 ③方国瑜：《彝族简史（长编）》第一章第一节。
- ④⑤〔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26页。
- ⑥《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74页。
- ⑦《德布氏史略》（复写翻译本）。
- ⑧《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12页。
- ⑨见《纳西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云南省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之二》第6页。
- ⑩《勒俄特依》第25—35页。
- ⑪《嘉庆一统志》、《读史方輿纪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